

《西北大学学报》的孕育、诞生及其社会地位

姚 远, 柏一林, 徐怀东

(西北大学 学报编辑部,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 通过历史文献考证, 认定创刊于 1913 年 7 月 1 日的《学丛》, 为《西北大学学报》的前身, 并认为由西北大学前身陕西课吏馆和陕西法政学堂先后主办的《秦中官报》(1903-04 创刊) 为《学丛》的诞生作了准备。结论认为《学丛》为中国综合性大学创刊最早的学报之一, 仅次于东吴大学 1906 年创刊的《学桴》。

关键词: 《秦中官报》; 《学丛》; 《学桴》; 西北大学; 东吴大学; 中国大学学报

中图分类号: G237. 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731(2003)04-0115-06

西北大学是中国西部最为古老的综合性大学之一, 创建于 1902 年。在其赓续百余年的历史中, 曾创办过 30 余种学术期刊^{[1](P365-385)}, 尤其是西北大学 1913 年 7 月 1 日创办的《学丛》文理综合性双月刊, 标志着《西北大学学报》的诞生。值此创刊 90 周年之际, 特对其起源和发展作一简略的回顾。

一、孕育时期

稍晚于西北大学“渊源”源头陕西大学堂的陕西课吏馆初创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4月,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改为陕西法政学堂。由课吏馆和法政学堂先后主办的《秦中官报》对孕育和催生民国初年的西北大学学报, 有着积极的意义。

陕西虽然远在汉唐时期即创办有《邸报》, 号称中国乃至世界报刊的嚆矢, 但至明清时代, 这种传统已难觅昔日的辉煌。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一月, 陕西布政使李有芬在西安秦中书局创办《秦中书局汇报》月刊, 内容包括朝廷谕旨、明道、理财、治兵、洋务等, 是为陕西地方第一份正式的官报。原以为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三原创办的《关中学报》半月刊是陕西教育机构所办最早的刊物^{[2](P950)}, 但现在看来,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九月由陕西课吏馆创办(后由陕西法政学堂, 再由陕西学务公所继办)的《秦中

官报》应为陕西教育机构所办最早和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刊物。

《秦中官报》初为五日刊, 但随着政体更迭或经费情况也有按半月刊或月刊出版的情况。该刊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改名为《秦报》, 但《秦中官报》字样却在刊中同时出现。其主办机构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月改由陕西法政学堂主办, 光绪三十四年(1908)九月上旬又改由陕西学务公所编辑出版, 并同时由《秦报》改名为《陕西官报》。《陕西官报》为旬刊, 约出版了 14 期(现存陕西省和湖南省图书馆)后, 于当年停刊。这样, 该刊连续出版 6 年, 总共出版了 320 期。

《秦中官报》的主要办刊目的是“使课吏馆在学人员能明了本省情况和中外时局, 以增广见闻”, 故将秦中官报局附设于课吏馆, 并由课吏馆作为主办单位, 负责编选。其主要栏目有: 谕旨恭录、秦事汇编、直省文牍、外报汇抄、文艺存略、路透电音等。它在政治倾向上无疑是首先忠于清王朝和抵制维新, 陕西藩台樊增祥在其《秦中官报·序》中就有“戊戌之事株连秦人不少矣, 是秦人不愚于祖龙之焚书而愚于无父无君革命平权之邪说也”之说, 而且还诅咒主张维新改革者是“野狐怪鸟”, 是“再醮之妇”^{[3](P1)}。然而, 它在客观上也向陕西传播了世界各

收稿日期: 2003-07-06

基金项目: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KJXC2-W 6)和中国高校科技编辑学基金项目(2001-01-16)资助课题

作者简介: 姚 远(1955-), 男, 陕西岐山人, 西北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 从事中国科技史研究; 柏一林(1957-), 男, 陕西长安人, 西北大学学报编辑部副编审; 徐怀东(1945-), 男, 陕西韩城人, 西北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

地、中国南北和陕西社会发展的一些消息、报道、论述、文艺作品和知识,尤其将“秦事”作为主要内容,就成为今天了解清末陕西地方历史的重要文献。

其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份第一期“外报”栏转载有《四川官报》的《四川劝工局章程》;同年第2期转载有《晋报》的《湖南熊庶常希龄考察醴陵瓷业》和《湖北工业学堂制造各种机器价目表》;同年第3期转载有《四川官报》的《南洋官报说卫生学》和转载《北洋官报》的《美国东亚商务论》;同年7月份第5期转载有《晋报》的《北京学界志士敬告全国学生抵制美禁华工续约文》;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份第3期转载《东方杂志》的《王鸿年日本制纸事业大要》;同年十一月份第5期转载《津报》的《山东法政学堂管理规条》。这些报道,传递了发达省份有关科技、工业、学堂教育、学界爱国运动以及中美商务、日本造纸等消息,无疑会给地处西陲的陕西带来新的思想和风尚。其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份第6期所载樊增祥的《送陕西高等学堂学生留学东洋序》;光绪三十二年(1906)四月份第3期所载的课吏馆分校《焦丞批学员补用典史李光远看语判语》;同年十一月份第5期所载的署藩司锡《批高等学堂学生康炳勋等恳留仇监督办理学务禀》;同年四月份第5期学院朱的《移送宏道高等学堂章程文》(附章程);同年七月份第6期所载高等学堂第一名学生尹钧的论文《德育智育体育论》;同年九月份第4期所载陕西高等学堂的《牌示学生遇讲授时或有质问不能纷纷拥挤致违堂规文》;光绪三十三年(1907)第2期所载曹鸿勋《批高等师范法政中学陆军各学堂全体学生等为全陕铁路必欲自办恳请代电以杜覬覦禀》等等。这是记载陕西地方高等教育、留学教育、学生学术研究、学生运动的重要史料,几乎已成为今人研究清末陕西教育史的惟一文献源,从中亦可窥知当时学生不满压制自由,抗争封建礼教,渴望改善填鸭式教学,要求开展课堂讨论,以及关心陕西地方建设,与当局公开抗争的爱乡爱国热情。

作为“官报”,仅供课吏馆或法政学堂学员增广见闻,当然不能发挥其更大的作用。因此,《秦中官报》在提出《培植官吏蔚为通博之才》的同时,也提出“启迪绅民养成识时之俊”的办刊宗旨,并“通飭各属”;甚至“迭经通飭,源源颁发”。然而,在发往各地的途中,常常出现缺期、丢失现象,“禀称领报不全者,不一而足,深堪诧异。推原其故,无非经过驿站拆封偷窃”^{[41](P9)}。为使《秦中官报》“务期速达”和“预防散失”,课吏馆发出《通飭各属转递报章禁止沿途拆

阅遗失等情札》,“除委员按站查明前所遗失严行惩治外,并嗣后每次发报加用印花以防混蔽,外合行札飭,札到仰该府州查明定章于每次官报到时,逐一亲验印花有无折损,报本有无缺少,如无混蔽即行转发各属。倘敢仍沿积习,立即跟究。”^[41]另外,在批评“一任驿卒之巧偷擅取,而不加察,又安用此有驿管驿之官吏”的同时,也对驿卒乐于该报的志趣表示嘉许,即“邮亭走卒亦知官报之足贵,志趣亦良可嘉,自应呈明所在官司,报情请领,本司亦必乐于颁发”^[41]。

光绪三十三年(1907),课吏馆改为陕西法政学堂,故从当年三月以后出版的《秦中官报》改为“法政学堂选印”,页码比以前有所增加,有时甚至达300多页。

光绪三十三年(1908),陕西学务公所接办后,又对办刊宗旨和发行方式作了一些改进。首先,新报明确指出:“本报接续《秦报》(即《秦中官报》)办理,广加搜辑,内容丰富,定名《陕西官报》”;“《秦报》停版略久,积压文牍甚多,本报限于篇幅,悉心甄别,择要录登”^[51],可见对暂时停刊期间的积压文稿也有交代。同时,新报提出:“本报政治文牍,凡奏章等件,均先本省,次京外,以符名,从主人主义。”这就使刊物的地方特色更为突出。在出版周期方面,改为“每旬出版一次,正、腊月两月停印三期,全年共出版三十三册,闰月照加。每份价银三两四钱,凡由邮局寄者每册邮费三分,全年合银九钱九分,概不零售”^{[51](P封2)}。其具体的订阅读行方式为:“各属历年认定销售《秦报》份数,照章札派所定之价,不得援折扣例”;“各处订阅本报或愿充代派处者,请函告学务公所图书馆,以便按期照寄”;“代派处销至十份以上者,报资九折,应缴邮费仍照前例,其派出之报皆照原价,不得多加分文”;“代派处认销订阅全年者,收到本报第一册,即将报资邮费收交,以便续发”。这些订阅读行办法,可谓完善,然而,改名后的《陕西官报》仅办14期,即于当年十月停刊。这种办刊宗旨、内容和发行方式,也从此终结,但它在办刊形式、用刊物于教学等多方面孕育了辛亥革命后三秦公学、西北大学的学术期刊。辛亥革命后,陕西教育机构的新办刊物以少转载、多征稿,以及其学术性、探索性、记事性的新特点,迎来了学校办刊的新时代。

二、诞生时期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救亡图存、维新变法、废除科举和兴办新学的历史转折之际,我国的近代高等教育揭开了新的一页。其时,西学渐次引入我

国高等教育,新旧教育体制相互交织,在矛盾碰撞中发展,而政体、国体和法制亦尚未完备。西北大学创办的第一份学术期刊,亦即《西北大学学报》的前身——《学丛》,就诞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中。

1989年,我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发现《学丛》创刊号孤本,稍后又在四川省图书馆发现第2期和第4期,并确认为我国近代有大学以来所创办的最早的学术刊物之一^[6],又“顺藤摸瓜”,对西北大学创办的其他30余种期刊也作了一一调查^[6-7]。有的学者以陕西早期书院和学堂主办的新闻、讲义或报刊文章汇编性质的刊物为据,对此提出异议^[9],实际上,这是在关于“大学”、“综合性大学”、“学术性期刊”、“学报”这些关键词的理解上发生了误会。我们所说的“大学”,是指实施高等教育的学校;“综合性大学”是指由若干不同学科(文、法、理、工、农、医等)的院系、科组成的高等学校;“学术期刊”和“学报”是指以发表较为专门、有系统、有创见的学问的,以及连续性和周期性出版的刊物,并且所发表的论文应是一次文献。因此,将诸如关中学报馆的《关中学报》等指认为综合性大学学术期刊或学报,是极为不妥的。

在此过程中,我们也在北京和成都阅读了现存的第1、2、4期《学丛》的全部内容,从而获得一些新的和更加全面的认识。

1. 创办时间和出版状况

《学丛》,又名《西北大学学丛》,这在创刊号的凡例中规定得很清楚。其确切创刊时间应为民国二年7月1日,即1913年7月1日。这说明,在西北大学创建一年之后,即创办了自己的学报。

该刊在创刊号凡例中规定“按月发刊一次”,又说明“因材料之多寡得随时增减”^{[10](P封2)},但是,从现在见到的3期来看,大概《学丛》一开始便遭遇了稿源不足和经费拮据的困难。因此,第2期延至9月出版,似已成双月刊。第4期所存孤本缺页,已难辨出版日期,但据其中所载的《教育部布告第五十七号》的发布日期“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和所载《西北大学中华民国三年上学期政法商别各科人数表》来看,则可能在1913年底或1914年初。这也可能是最后的停刊时间。因为不久之后的1914年6月,陆建章即率兵入陕,开始了对西北大学的破坏。据此,《学丛》自1913年7月1日创刊,可能到1914年初停刊,共办4期。

令人疑惑不解的是在《中文旧期刊联合目录》(1884—1949)中载明,西南民族学院图书馆尚存有《学丛》(月刊)第25卷第1期,并标明为1936年出

版,由西北大学编行。然而,在1992年5月我们前往该校图书馆查阅时,虽有一些当事人回忆有从四川大学移交的这份刊物,但却始终未见实物。

《学丛》的印刷和发行均为本校出版部。另外,在北京顺治门大街秦中公寓、天津自由镜报社、上海商务印书馆、汉口商务印书馆、甘肃行政公署、西安省垣各书局和新疆行政公署设有代派发行处。零售定价为每册大洋3角;代派定价10份以上9折,30份以上8折,50份以上7折。邮资标明为:本国每册3分;日本每册3分;外国每册5分。登载广告的价目为:特等每面30元,上等每面20元,普通每面12元,半面7元。

学校出版部是在1913年3月至7月间筹备成立的,应为今天西北大学出版社的前身,也无疑是中国西部地区最早的大学出版机构。它设在学校东侧,设有印刷机2台,石印、铅印机器各1部。出版部除印刷讲义、学生文稿和对外承印宣传品、采购书籍和文化用品外,其主要任务是印刷书刊。《学丛》即为其出品之一。

2. 办刊宗旨和内容特点

(1) 鲜明的学术性办刊宗旨 《学丛》创刊号的“凡例”规定:“本报为研究学术,故所登文字注重学理,凡与学术无关者,概不刊入。”这就确定了《学丛》的学术理论性质。

《学丛》栏目的设置和顺序安排也体现了侧重学术的特点。刘芬的《学丛·序》对此特别作了说明:“学术基于思想,发明赖乎文章,故首之以论说;规画重在实践,成法尤贵参观,故次之以纪事;治事混争,适用法理,则判例次之;礼失求野,借镜择长,则译述又次之;然鳞爪不弃,片言珠玉,时虞漏网,故以杂录终焉。”这就将《学丛》开设论说、讲演、杂纂、纪事四大栏目的设计思想表露无遗,体现了以学术性很强的论说、讲演为基线,以纪事、判例、译述等实际事例和他山之石相辅,并以辑录思想火花的杂纂为补的独到办刊思想。其栏目设置既各有特点,又互相关联,既灵活多样,又中心突出,既祛清谈,又求实用,可谓相辅相成,浑然一体。

在谈到为什么要创办《学丛》时,学术仍被提到首要地位。刘芬的《学丛·序》首先追溯古代关中的学术发展,指出“关中襟山带河,夙称天府。周秦汉唐之所经营,典章文物之所荟萃,名儒伟人之乘间而迭出,彪炳史籍”。然后,他又谈到近代关中落后在学术上的原因。他认为:“列朝以降,地气南移,交通阻滞,风气闭塞,士习于固陋,农安于游惰,工流于苦窳,商

困于疲滞。地瘠民贫，西北为最，而无由日跻于文明。识者曰此皆不学之过也。夫世无论古今，以教育为要，学无论新旧，以经世为归。时至今日，守旧者，空疏无用，冒托国粹之名；新进者，竞尚浮华，卒鲜专门之学，而人才日少，学风日坏，国政日非。二三君子闾焉忧之，览沧河之横流，惧斯文之或坠，出而提倡之，扩充之，阐法政之真理，树大学之先声。”由此，在“课余之暇，或本心得而抒伟论，或因雄辩而发危言，笔而录之，采而辑之，名曰《学丛》”。其目的在于“角艺争长，借资砥砺，片羽吉光，无关宏旨，将欲免屠龙之诮，而励士子向学之忱也”。他还指出创办《学丛》的宗旨是：“求实用，祛清谈，化党见，谋公益。改良社会，毋泥古而不通今；宏济时艰，毋见小而失大体。绵文武之遗泽，宏汉京之雅化。”^{[11](P1)}这里，显然已对《学丛》要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文风，以及承担起光大汉唐文化的历史使命等，提出了明确的目标。

从所见3期《学丛》发表文章的情况来看，亦较好地执行了办刊宗旨。3期共发表文章149篇，其中学术论文和带有学术性质的杂纂就有100篇。因此，《学丛》无疑为一份学术性很强的期刊，它与今天的“学报”的性质和要求是等同的。

(2) 重之以政、法，杂之以理、工 一般来说，一份大学学报是以反映本校学术研究成果为主的。因此，其学术水平与该校的科研水平大致上呈“水涨船高”的关系。《学丛》既然就是当时西北大学的学报，它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的内容和水平，也就与当时西北大学的实际学术研究状况和水平是大致相当的。

西北大学最初的前身为陕西大学堂、陕西法政学堂、陕西农业学堂、陕西实业学堂等校。1912年初，先后设有大学预科、哲学科、外国语专修科、法律科、政治科、经济科、商科、边务科、史学科、农林科、农科、林科、蚕桑科。师生来源亦大部分直接来自法政学堂、农业学堂和实业学堂等校。这是《学丛》稿件来源的基础。

在诸前身中，法政学堂师资、生源均较为雄厚，西大亦以法政学堂校址为基础，进入较高年级的学生亦以法政学堂转来的学生居多。因此，在1915年春季陆建章撤销西北大学时，即改其为陕西法政专门学校。这奠定了《学丛》稿件以政、法为主的基础。在所见3期《学丛》中，论文和杂纂的学科分布分别为：法学39篇；政治学33篇；经济学14篇；史学9篇；哲学7篇；神学2篇；理工纪事4篇。其中政、法类的论文占到总篇数的66%。

在政治学方面，很多论文所提的问题相当尖锐，

并贴近现实，如创刊号发表的政治科二年级学生陈钟秀的《内阁政治之得失》一文，即从分析日、德、英、美、法诸国的政治制度入手，论述内阁政治在我国实施的利弊，提出“国会中必有二大政党之对立”和“两党须有相当之程度”的观点，认为“我国政党既有非历史之根据，且无政见之可言，使之组织内阁，非若傀儡登场”^[12]。这些认识对民国初年政体、国体尚未完备的情况来说，不失为一种有胆有识的见解。《学丛》创刊号还分别发表了政科学生华俨、董彦儒、陈钟秀、陈宏滔4人4篇关于“社会主义能否适用于今日之中国”的学术争鸣性论文。《学丛》第2期和第4期还发表了程鹤云、张文彦、刘靖、宫瀑4人关于《新内阁成立，减裁行政机关，停止司法，进行名义上撙节财用，实际上究寓何种政策》的两篇论文，直言评论袁世凯政府的现行政策，可谓极近于现实了。这或许是稍后西北大学被撤销、《学丛》被停刊的根源之一。

在法学方面，创刊号发表了政科学生何天衢、法科学生汪成翰等人关于“讨论制定宪法与选举总统孰先”的4篇论文，从英、美立宪史及中国法律、政治、时局的实际情况分析入手，认为宜先制宪，而后选总统为宜。政科学生赵仰山的《国宪问题私议》，也对主权、国家、种族、立法、行政权、司法权等作了较透彻的阐述。这些内容是当时国人讨论得最为热烈的话题之一。《学丛》亦载文认为，这是“迩日以来国事之最为腾诸耳食，接诸眼帘，揭载于报纸，聚讼于舆论者”^[13]。这一讨论是由钱钧鹤校长和教务长兼商科学长马凌甫组织命题的。马凌甫兼任经济学、宪法课程，功底深厚。由这样的教师来组织学术讨论并为《学丛》组稿，其水准自然不会低。其他还有不少论文涉及民事诉讼法、刑法、法律史、外国法、经济合同、案例等多方面。

在理工方面，创刊号报道了蚕科一、二两班及简易班饲养春蚕的实验和实习活动。另外，对一些涉及理工的国际会议作了简短的报道。如：1912年3月25日在圣彼得堡举行的“关于铁道安全之国际会议”；1912年4月3日~21日在柏林举行的“万国飞行博览会”；1912年4月4日~21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万国飞行发动机博览会”；1912年4月7日~21日在巴黎举行的“第四次法语国间之医师会议”；1912年4月14日在罗马举行的“第七次结核病国际会议”；1912年4月16日在罗马举行的“万国社会卫生学博览会”；1912年4月16日~19日在柏林举行的“第五次心理学实验之国际会议”；1912年4

月23日在威尼斯举行的“万国技艺博览会”；1912年在伦敦举行的“万国园艺博览会”；1912年6月3日在圣彼得堡举行的“万国火灾救援博览会”；1912年6月4日在伦敦举行的“万国无线电会议”；1912年8月6日~12日在伦敦举行的“第七次万国医学大会”；1912年9月2日~13日在华盛顿和纽约举行的“第八次万国应用化学会议”；1912年9月9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第十四次人类学及史前古生物学会议”；1912年9月25日在海牙举行的“万国制药者联合会议”；1912年10月4日在伦敦举行的“万国工学博览会”；1912年10月15日在巴黎观测所举行的“万国时刻计算会议”；1912年10月17日~23日在巴黎举行的“万国比较病理学会议”；等等。这从另一角度说明西北大学早在创建之初就具有面向世界的办学姿态。

在一些文科的论文中，也有运用自然科学成果阐明事理的例证，如政科学生华俨在创刊号上所发表的论文，即涉及了生物学、物理学上的一些新知识。杨季石的《武装平和论》一文涉及英、德、美、法、奥、意、日等国的战舰、巡洋舰、驱逐舰、水雷舰、潜艇等新的军械装备知识。另外，在所载“各科试验问题”中，也有一些论题为自然科学问题。如：“昆仑山共分三脉，其中脉俗名北岭，试记其名山之名称并起伏连接之势”；“说明定经纬度之法”；“扬子江发源地，流入何海并某支流受某湖水，其灌域共经几省试言之”；“说明水及于地球之营力”；“西顿尼权亚苏撒耶尔撒冷撒马利亚皆属何国”等等。

(3) 面向学生办刊的特色 这一宗旨在创刊号凡例中说得很清楚：“本报以学生交换知识，互相砥砺为宗旨。”并且，以“甄录学生文字，考察学生心得”为主。其具体是由各科学生投稿，然后择优刊登，也有以学校或刊物名义组织的一些稿件。除刊载校内学生稿件外，其他学校的学生如有心得、著述也可投稿，并受到“极力欢迎”。学校为了增强司法行政类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亦经常在周末由各任课教师命题两道，集合全体学生发表演讲，之后由教师当场加以评断，称为“雄辩会”。会后，一些较好的发言稿，会被推荐到《学丛》发表。如第一次雄辩会以钱鸿钧校长和马凌甫学长所出的“制定宪法与选举总统二者孰先”为论题，第二次雄辩会以宋镜涵、梁凯铭二讲师所出的“划分国际税与地方税之研究”为论题。辩论结果都形成了一组学术争鸣性论文，均被先后发表于《学丛》。

在《学丛》创刊号中，共发表了38篇文章，其中

32篇为政科、法科、边务科、大学预科的学生所撰。除此之外，《学丛》还发表各科各学期的论述性试题，这对于启发学生选题撰文是很有益的。

《学丛》面向学生办刊，起到了培养学术新秀的重要作用。正像《学丛·序》所说：“人材犹种树也。筑室可不日而就，种树非数年不荫。今者维新告始，万绪千条，百事可就，而兴学育才不可一日致也。以种树譬之，学校，园圃也，学生，花木也，灌之，溉之，培之，植之，则讲师之责也。”^[14]这与同时期其他校办学术刊物以教师论文为主或间以学生论文的做法相比，形成了《学丛》鲜明的特色。

三、《学丛》在当时全国高校所处的地位

西北大学建校以前，国内建有7所基督教、天主教教会大学，另有国立、地方、私立各1所。即在西北大学建校前国内有10所大学，连同西北大学在内，1912年以前建校并称为大学的共有11所。实际上，其中7所均系外国教会所办，国内所办的仅4所，北洋大学和西北大学同为仅有的两所地方办大学。

在西北大学之后，1921年以前建校的有著名教会大学8所和私立大学7所。在西北大学创建之前的10所大学中办有期刊的共有4所大学，其中学术性较强的刊物仅有上海圣约翰大学的《约翰声》双月刊和东吴大学堂的《学桴》（又名《东吴月报》）等刊。这样，西北大学创办的《学丛》就成为我国综合性大学中创办的具有学术性质的最早的刊物之一。它也是目前所知我国地方政府所办大学创刊最早的一份学术性刊物。

即使将在此前还称不上“大学”的一些学堂所办的刊物考虑在内，《学丛》仍不失为我国高校早期创办的重要学术刊物之一。比如在《学丛》之前创办的《约翰声》（圣约翰大学，1894）、《利济学堂报》（浙江瑞安利济医院学堂，1897-01）、《农学报》（武昌湖北农务学堂，1901）、《童子世界》（南洋公学，1903-04）、《武备杂志》（保定武备学堂北洋武备研究所，1904-03）、《广州旬报》（广州南武公学，1905-11）、《北直农话报》（保定高等农业学堂，1905-11）、《蚕学报》（广东蚕业学堂，1908-06）、《福建法政杂志》（福建法政学堂，1908-06）、《震旦学院院刊》（震旦学院，1909）、《龙门杂志》（上海龙门师范，1910）。这些学校大都还不具备高等教育的条件，也未称以“大学”，更难列入综合性大学的范围。其办刊内容较为单一，学术性较弱，尚难与《学桴》《学丛》等刊相比拟。

参考文献:

- [1] 姚 远 中国大学科技期刊史[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 [2] 袁明仁, 李登弟, 山 岗 三秦历史文化辞典[M] 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2
- [3] 樊增祥 序[J] 秦中官报(另见《樊山政书》卷六), 癸卯年(1903年)9月份, (1).
- [4] 课吏馆 通飭各属转递报章禁止沿途拆阅遗失等情札 [J] 秦中官报, 甲辰年(1904年)3月份第8期
- [5] 陕西学务公所 陕西官报·序言[J] 陕西官报, 光绪戊申(1908年)9月上旬(13).
- [6] 高立勋 西北大学学报编辑姚远发现西大早期《学丛》为我国最早学报之一[J] 光明日报, 1990-07-24(2).
- [7] 高立勋 西大《学丛》被认定为我国最早出版的学报[J] 西安晚报, 1990-03-08(2).
- [8] 姚 远 解放以前西北大学学术期刊的演变和发展[J] 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90, (3).
- [9] 梁 宵 也谈我国最早的学报[J] 西安晚报, 1990-09-11(3).
- [10] 编著 凡例[J] 学丛, 1913, (1).
- [11] 刘 芬 学丛·序[J] 学丛, 1913, (1).
- [12] 陈钟秀 内阁政治之得失[J] 学丛, 1913, (1).
- [13] 赵仰山 国宪问题私议[J] 学丛, 1913, (1).
- [14] 黄福藻 学丛·序[J] 学丛, 1913, (2).

[责任编辑 刘 欢]

On the Preganacy, Birth and Social Position of

the 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YAO Yuan, BA I Yi-lin, XU Hua-dong

(Editorial Board of the Journal,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By means of textual research, we believe that *the Journal of Collected Essays*, which started its publication on July 1, 1913, was the former body of *the 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We also believe that *th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Central Shaanxi* (started its publication from 1903 to 1904) run by Shaanxi Imperial Official School and Shaanxi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 the former body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paved the way for the birth of *the Journal of Collected Essays*, we come to conclusion that *the Journal of Collected Essays* was one of the earliest Journal created by the comprehensive universities in China, second only to *the Journal of Learned Raft* of Dongwu University which started its publication in 1906

Key words th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Central Shaanxi; the Journal of Collected Essays; the Journal of Learned Raft; Northwest University; Dongwu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 journals in China

西北大学王维坤教授认为:

丝绸之路发现死者口“含币”习俗是口“含物”的发展

西北大学王维坤教授在《考古学报》2003年第2期发表的《丝绸之路沿线发现的死者口中含币习俗研究》一文中认为:死者口中“含币”习俗是在死者口中“含物”习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死者口中“含物”习俗约在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姜寨第一期文化就已经出现,后来这种埋葬习俗不断向四方传播,口中含物也由原始社会乃至商周时代商品交换的媒介物——贝变成了秦汉隋唐以来的铜钱,在中西文化交往频繁的汉唐时期,死者口含拜占廷金币,波斯萨珊朝银币以及它们的仿制品的埋葬习俗也在相当大的地域内粉墨登场。此后,作者在日本同志社大学和富山大学做客座研究员期间,曾以此为题在京都和富山进行过两次演讲,得到学术界普遍赞誉。同时作者认为,从考古学的发现来说,死者口含币不仅与祆教之间没有直接联系,而且也与信仰祆教的粟特人的葬俗相去甚远。这种口含币习俗并非先从西亚、中亚传到今天的新疆,然后再传到中原内地,恰恰相反,是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先从中原内地传到甘肃、新疆,然后再不断地向西传到了中亚和西亚。近年,考古工作者在青海发掘了一批汉晋墓葬及唐代前后的建筑遗址,出土的实物资料为丝绸之路与死者口含币习俗提供了新的佐证。因此,那种笼统、简单地把中国境内出土的金银币同西方所谓死者口含币的习俗联系在一起的说法,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高立勋)